

李国文
文集

随笔八

天下文人

第 17 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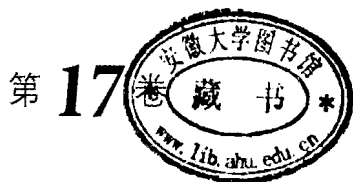
人民文学出版社

李国文 文集

随笔 八

天下文人

第 17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李国文文集. 17, 随笔. 8, 天下文人 / 李国文著.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1

ISBN 978-7-02-008622-1

I. ①李… II. ①李… III. ①中国文学: 当代文学-作品综合集②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98355 号

责任编辑 葛云波

装帧设计 何 婷

责任校对 韩志慧

责任印制 王景林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世纪兴源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269 千字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1.25 插页 2

印 数 1—3000

版 次 2012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08622-1

定 价 23.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出版说明

李国文是当代文坛的常青树。早年以小说成名，亦因小说获罪，被打成“右派”，备受迫害。“文革”后复出，驰骋文坛数十年，佳作不断，屡获好评。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起，逐渐将目光转向历史，写起了文化随笔，且一发而不可收，展示了其才华的另一面。

李国文的小说，素以直面现实，关注众生，剖析人生百态为特点；近二十年来，虽沉潜于历史，但他的目光也并未脱离当下，用嬉笑怒骂、幽默冷辣的文字，表达对历史、社会和人生的理解，自有一种严肃和深透。

我们编辑出版的这套《李国文文集》，收录其各种文体之代表作，凡十七卷十八册，集中呈现了李国文从文近六十年的创作成就。其中第一、二卷为长篇小说，第三、四卷为系列小说，第五、六、七卷为中短篇小说，第八、九卷为散文，第十至十七卷为随笔。小说收集较全，散文、随笔则经过了择选，若干篇目作者有不同程度的修订。

由于李国文从文时间长、著述丰，因此，在这套文集的编辑过程中疏漏在所难免，恳请广大读者不吝赐教。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2012年1月

目 录

时人不识李二曲	(1)
最有天才的女子	(16)
1644 年的北京	(30)
翩翩一只云中鹤	(46)
名士末路徒奈何	(60)
朱元璋的心结	(73)
乾隆写诗四万首	(83)
一代文人苏东坡	(94)
老夫聊发少年狂	(104)
最是凄寒二月天	(119)
我劝天公重抖擞	(136)
权力场中的角逐	(153)
生死关头见肝胆	(171)
江南才子何其多	(185)
文文山与谢叠山	(203)
帝王好写诗	(217)
耗子玩猫	(230)
李斯西行	(246)
人老莫作诗	(258)
白居易饮酒	(270)

明后七子一瞥	(287)
名父之子(外一篇)	(298)
袁枚的《随园食单》	(313)
春风又绿江南岸	(320)
汤显祖和莎士比亚	(325)
走近歌德(外二篇)	(331)
永远的巴尔扎克	(345)

时人不识李二曲

——文人的品格

“关中三李”，现已不为人知，可在三百多年前，却是学界耳熟能详的提法。

三李系指周至县的李颙（1627—1705）、眉县的李柏（1630—1700）、富平的李因笃（1631—1692）。这三县都在关中，故而得名之。

他们为明末清初的一代名儒，无论道德，无论文章，都是当时众望所归的代表人物。不过，德国诗人海涅说过：“文学史是一所硕大无朋的停尸场，人人都在那里寻找自己亲爱的死者，或亡故的亲友。”也许，掀过去的一页，就永远定格在历史的那一时刻了，除非有人寻找，谁也不会在意。如今，即使在三李的故乡，也不大有人提及了。

公元1703年（康熙四十二年）冬十月，玄烨西巡。

十一月十五日渡黄河，经潼关、临潼，当日抵达西安。侍卫和近臣都劝这位旅途劳顿的皇帝，稍事休息。无论如何，到底是年纪奔六之人，应该将养龙体。但一路走来，这位陛下圣猷独断，岂容臣工多嘴？他决定次日，也就是十六日清早，要到沙场阅兵。圣旨一下，满城大乱。当地的抚督臬按，检巡府监，将帅校尉，以及参阅兵佐，整整一宿，谁也不敢合眼，忙乱得脚打后脑勺。

幸好，中国人对付皇帝的最妙之术，曰：“齐不齐，一把泥。”只要大概齐说得过去，就会给皇帝留下军容整齐，骑射娴熟的印象。特别是下了一条死命令，俺们老陕别的本钱没有，会吼秦腔不？会吼信天游不？那本官拜托众位，放开嗓子吼万岁，这是最能讨好陛下的手段。

玄烨心里很清楚，这既不是老百姓在骗皇帝，也不是皇帝乐意被骗。在中国，舞台上演戏的是演员，舞台下看戏的也是演员。台上的人演给台下人看，台下的人也在演给台上人看的。你若悟到这一点，真得恭喜你，中国社会百分之五十的真谛，算是被你掌握了。

果然，那一天，在演兵场上，骑着马的戎装玄烨，顾盼四望，目光所及，万岁万岁万万岁的吼声，地动山摇，几乎令渭水为之倒流，差点让终南为之余震，教玄烨好一个得意。再次日，也就是十七日，心情怪不错的陛下又下了令，恩免陕西、甘肃两巡抚所属地方当年钱粮，消息传开，当然让黄土地的乡亲们喜不自胜。三天以后，也就是二十日，又下令陕西绿旗兵把总以上官各加一级，八旗兵将军以下、骁骑校以上各加一级。这一连串派糖活动，说明老爷子很高兴，也说明陕西方面上上下下着实下了工夫，卖了力气。

虽然还不到腊月，离过年还远，压岁钱倒先给了。看来，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如何糊骗得皇帝老子开心，如何唬弄得万岁爷龙颜大悦，是各级官员首先要学会的功课。阅兵那天，玄烨看到万岁不离口，嗓子都喊哑的众军士，颇为感动，亲口对抚军博霖宣示：“朕历巡江南、浙江、盛京、乌喇等处，未能有及西安兵丁者。尔处官兵俱娴礼节，重和睦，尚廉耻，且人材壮健，骑射精练，深可嘉尚，慎勿令其变易。”

在一旁侍候的巡抚鄂海，虽是一位庸吏，拍马术还是相当精通的，听到圣上这番奖谕以后，自然也掩嘴偷着乐。不过，鄂海还是捏着一把汗。因为，双管齐下，文武齐抓，习惯于两手皆硬，是当今

圣上的行事方式。武的,他已经检阅过了,文的,也少不了要审视一番。果不其然,圣上的眼神落在鄂海身上,显得有话要说。当时吓得他一激灵,脑门子沁出一层冷汗。满清官员,对皇帝,一张口就是奴才,而隶属八旗出身的满洲官员,则尤其是奴才相十足。一到这里,只有垂手侍立,双肩胁紧,竖着耳朵,一口一声的“嘿”,恭听圣训了。

因为康熙一过潼关,就发出手谕,要召见周至县的一位名叫李颙的“处士”。现在,陛下查问鄂海的,正是这项安排。

李颙是谁?谁是李颙?对今天的读者来说,可是一道真正的难题了。清人陈康祺《郎潜纪闻初笔》卷八《北学南学关学》条目中这样说:“国初,孙征君讲学苏门,号为北学。余姚黄梨洲先生宗羲,教授其乡,数往来明越间,开塾讲肄,为南学。关中之士,则群奉西安李二曲先生容(颙),为人伦模楷,世称关学。”三百多年过去之后,这位关学领袖,即使你到西安最繁华的鼓楼大街,挨着个地向当地人打听,我估计,十之八九,不大会有人知道这个名字。向文联、作协的诸位贤达打听,十之七八,也未必能说得上子午卯酉。

有一年,我在西安,请教过一位文学界同行,如今在周至县,可还能找到李二曲老先生的什么遗迹么?他看了看我,眼白多于眼黑。反问道,那该是与魏长生、刘省三同辈的唱秦腔的老艺人吧?他这一说,倒使我一时语噎,不知如何应对。对于陕西籍,甚或西北籍人士,酷嗜这门地方戏,到了偏执的程度,我最早是从鲁迅先生的日记中领教过的。民国初年,先生到北京任教育部佥事,赴西安考察,其中观摩易俗社的秦腔表演,那种非看不可、不看行的热忱,让先生很有点吃不消的。于是,接下来,因无话好说,只好听这位文学界朋友,谈当地那些名流,谁和谁结婚,谁和谁离婚,谁和谁结婚又离婚,谁和谁离婚又结婚之类的花边新闻。

对于皇帝来说,最怕的是生前被人冷落,而对于文人来说,最怕的是死后被人冷落。皇帝没有人将他当回事,估计他离末日也不远了,而文人死了以后,人们根本想不起他来,才是这位文人莫大的悲哀。才三百年过去,几乎连他的家乡人也将他淡忘。谁人还识李二曲?能不令人感慨?

虽然结婚离婚已经如此之方便和轻易,说明后解构时代确实已经来临,但我仍然觉得将这样一位在明清易代期间的广知博瞻,著作等身,文章道德,世所共仰的大儒;一位与统治中国已经近六十年之久的清朝政府始终保持距离的文人;一位既未应明代科举,也未进清朝考场,全凭自学成才,苦学钻研,从六经诸史,百家诸子,到佛经道藏,天文地理,无不烂熟于胸的学者,人称“关中三李”的代表人物李颀,中国文人坚贞不屈的品格榜样,抛诸脑后,置若罔闻,忘了个干干净净,是有点说不过去的。

历史并不要求你记住所有一切,这就是人类审视自身来历时的大度和宽容;而是希望你记住应该记住的,如果应该记住的都置之脑后,那人之异于禽兽者还有几稀,可真是问题了!

李二曲之所以被弘扬,被张大,被高山仰止到楷模、典范、先贤、大师的地步,因为公元1664年的明清鼎革,对当时的每个中国人来讲,都是一次切肤之痛的深刻体验。中国历史上的改朝换代,何止数十百次,从来没有像清人进关这一次,伤筋动骨,摧肝裂胆,几乎无人能逃过这场生死劫。且不说“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就脑袋顶上的几根毛,也是决定性命的抉择。你要明朝的头发,你就不能要脑袋,你要保全这颗脑袋,你就得剃得光秃秃只留一根猪尾巴似的大清辫子。所以,在屠刀和剪刀面前,文人之降服变节者,软骨摇尾者,卖友求荣者,陷害密告者,无耻佞从者,投机取巧者,拍马钻营者,苟且偷生者,多得让人窒息,多得成为灾难。

因此,一不应清廷科举,二不为清廷官吏,三不与清廷合作,四

不和清廷来往，始终自居遗民身份的李颙，便格外为人景仰。人心是秤，公道自在，有清三百年间，海内不知二曲先生者甚少。而三百年后，西北那黄土高原，除了安塞腰鼓，除了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可有一位撑得起“关学”这样字号的大学问家，独领一方，独开一面，也好让我那位西安朋友，不要一听到李二曲的“曲”字，马上先就联想唱秦腔的老艺人，显得乏善可陈的孤陋寡闻了。

契诃夫 1886 年写过一篇小说《头等客车乘客》，一位建桥的工程师，对同一包厢的乘客说，他一辈子给俄罗斯造了二十座大桥，没有人知道他是谁。一次新桥落成庆祝大会，当地的报纸，竟无一个字提到设计者的他，相反，他带去的一个歌女，却有着连篇累牍的报导。还有一次，他应莫斯科市长之请，去博物馆发表演讲。正当他走上台致词时，全场观众一齐向窗口跑过去，向正在路过的短跑运动员欢呼致敬。说到这里，与他同行的乘客反过来问他，你可知道我是谁吗？这个旅伴，不但在大学里当了三十多年的教授，而且，还是科学院院士。于是，这两位头等客车乘客“互相瞧着，扬声大笑”。

但是，大清王朝的皇帝，尤其这位圣祖，可不是吃干饭的，对这位“关学”领袖，印象不但深刻，而且历久弥新。“处士李颙，人好读书，深明理学，屡征不出，朕甚佳之。”最后两句圣谕，语焉不详，究竟褒呢？还是贬？让在场的陕省官员，摸不清圣上的底细。他们深信，“处士”一词，出自圣谕，那玄机 and 奥秘，就够周至县的李二曲吃一壶的了。一般情况下，未经科举，未获功名的读书人，自称或人称“处士”，是很正常的。而李颙，快八十岁的白头老翁，行将就木的前朝老朽，呼为“处士”，就如同对鹤发鸡皮，风烛残年的老妇，叫她小姐一样，听来不免牙碜。按说，有了一大把子年纪，尚未释褐的老先生，便堂而皇之的“布衣”了。但玄烨不称他为“布衣”，而称之为“处士”，这就是统治者“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必然想法，你必须要成为大清王朝的良民。

“布衣”和“处士”，本无严格区别。但对玄烨来讲，体制内和体制外，这个界限是不可模糊的。

别看鄂海一脑袋糊涂糰子，但在意识形态领域方面，那高度防范之心，滴水不漏之意，倒与圣衷不谋而合。他掰着手指数了数，顺治爷坐江山十七年，康熙爷坐江山，至此公元1703年，也有四十二年，加在一起，大清王朝将近一个甲子。中国人五十年为一代，父生子，子生孙，李颺居然仍未改弦更张，另换门庭，继续当他的不入簪门的“处士”，继续做他的精神上的前朝“遗民”，所以，这次西巡，才生出召见这个花岗岩脑袋的想法吧？

他替圣上想，对于这个始终保持既不反抗，也不赞成的人生姿态，始终保持既不唱对台戏，也不随指挥棒跳舞的言行宗旨，始终保持超然物外，绝迹凡尘，独善其身，我行我素的文人品格的李颺，虽然一不生事，二不闹事，三不犯事，但陛下数十年打造出来的万宇一统，四海归心的大好局面中，有这么一个说不上是三心二意，可绝说不上是一心一意的死角，岂不让圣上有那种不够百分之百的遗憾嘛！

鄂海还真是揣摸透了玄烨的心思，陛下现在希望得到的，是政治上的绝对一统，是黎庶的完全归顺，是知识分子的心诚悦服，是大清天下的万古长青。四十多年前，他刚执政，也许不具有这样的自信，如今，屁股越坐越稳，江山越坐越牢，觉得“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局面，是应该得到实现了。不过，圣人早说过的：“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统治者追求完美、完善、完全，对多样、多元、多彩、多面的社会来说，这种原教旨式的洁癖，倒有可能成为升斗小民的磨难。老百姓最怕统治者放着好日子不过，非要无事生非，非要节外生枝。陛下呀陛下，您大人有大量，有必要非跟这个并不捣乱的老学究过不去么？

早在圣上决定西巡之前，巡抚鄂海就得到京城军机处的某位

章京的关照,说万岁爷此次到西京,有一个召见李颀的日程。鄂海接此信息,跌足长叹,直埋怨是谁出的这个鬼点子,让大家年都过不好。这个李二曲,岂是一个随便听摆布、任拿捏的文人么?他不惹你,谢天谢地,你要惹他,不是没病找病嘛!可文治武功,是历代清朝皇帝最为期许的一个高境界。这次西巡,既然要体现出圣上鼐勉士林的恩泽,莫过于召见当地最具代表性的文化界头面人物。在陕西省,甚或在西北地区,除了李二曲这样有年纪、有学问、有号召力、有影响力的大儒,再无适当人选。鄂海也就只好硬着头皮,派了一位干员,携了一份厚礼,趋访李颀,希望这位老学究给地方官一个面子。谁知,碰了个大钉子。这位“关学”领袖,“宴息土室”,“虽骨肉至亲,亦不得见”,已经二十多年足不出户了。

生于公元1627年(明天启七年),逝于公元1705年的李颀,享年78岁。玄烨西巡,是他死前两年,也就是1703年(康熙四十二年)的事情。老人家哪里想到,临死临死,又被推到政治斗争的风口浪尖上。二十七年前,公元1678年(康熙十七年)博学宏词科,他就躺在门板上,从周至县抬到西安,验明正身,他确实因病重,不能应皇帝的恩典,而不参与全国会试。难道,二十七年后,他老人家又得被抬到西安去见这位万岁爷么?

现在,摆在李颀面前的,是两道选择题,一是公然抗旨,拒绝参拜,惹恼皇上,引火烧身;二是抬赴省城,诚惶诚恐,山呼万岁,叩首跪拜。但是,他知道,他家人知道,陕西省的父老乡亲也知道,第一道题,他不敢做。在中国有皇帝的年代里,得罪了皇帝意味着什么,大家心知肚明。第二道题,他做不到。清人王士禛《池北偶谈·卷九·李颀》中说:“近盩厔李颀两经征聘,不出,有古人之风。颀以理学倡导关中。”六十年来泾渭分明的他,忽然屁颠屁颠地跑到西安行在朝康熙磕头,他还能继续做他的大宗师吗?乡党们的唾沫星子,就能将他淹死了。

李二曲有点七上八下,捏把汗,可想而知。不过,当今皇上也有点七上八下,捏把汗,就不免吊诡。因为玄烨不能不考虑,君无戏言,话放出去了,第一,老“处士”不来,不给你面子,你陛下如何处置?是杀他,是关他,还是亲手掐死他?第二,老“处士”还真的来了,给了你面子,你能赏他一个什么?他六十年都不买你的账,他会稀罕你的恩典吗?如果,他来了,还夹七夹八说了一些不三不四的话,你陛下又如何处置?是乱棍打出行辕?还是斩监候收押?虽然帝王之威,莫敢抗违,怎么处理也都是皇帝有理。可是,大清立国六十年,为此惩治一个你已经容忍了六十年的对立面,大动干戈,值不值得?这是公元1703年玄烨西巡中一段见诸史册的小插曲。

这插曲的实质,也是中国历来的统治者(尤以清代的前几位皇帝为剧),几乎难以幸免的“意识形态恐惧症”的反应,而中国文人的全部的倒霉和不幸,掉脑袋的如戴名世,不掉脑袋的如钱名世,前者满门抄斩,株连三族,说痛苦,一下了断,倒也爽快;后者,一顶“名教罪人”帽子,天天谢罪,说是苟活着,真的不若死去。这种生不如死,或者,死不如生的命运,无不系于统治者的这一念之间。

在清代文字狱案中,有两个名为“名世”的文人,常被混淆。一为《南山集》记南明事而被康熙开铡的戴名世(1653—1713),一为附年羹尧写拍马诗而被雍正收拾的钱名世(1660—1730)。雍正这个人,颇具阴刻的幽默感,书写了一块“名教罪人”的匾额,令其高悬于自家门口,每天一早起来,第一件必做之事,要向这块御题匾额磕头悔过。“文革”期间的“早请示、晚汇报”,不知是否受此启发?

清初最著名的思想家李颀,字中孚,号二曲,理学名士,闻于关中,为陕西盩厔(今周至)人。与孙奇逢、黄宗羲并为“清初三大儒”,又与眉县李柏,富平李因笃,共称为“关中三李”。是一位重

磅级的学问极高、品望极著的大人物,《清史稿》称他:“布衣安贫,以理学倡导关中,关中士子多宗之。”难怪康熙如此高看,如此关注,如此当回事地,竟屈尊要到西安来会他一会。

李颢幼年失父,家贫不能自给,无力支付塾师束修,乃辍学自读。曾讲学东南,主持书院,问名求道者,不绝于途,成为一代宗师。玄烨不是一位附庸风雅的政治家,是一个相当识货的统治者,他既然要追求这个广告效应,那必然会物色这样一位具有票房价值的明星。

当时,陕人一概呼他为二曲先生,这也是中国人喜欢以地名代替人名表示尊敬的一种方式。周至这个县名,是解放后给简化了的。原来的繁体字,难认难写,但有讲。水曲为“厓”,山曲为“磬”,他也就自号“二曲”。一个文人能得到家乡父老子弟的如此认同,能得到当时士林杏坛的如此敬重,自有其非同小可之处,更有其与众不同之处。其实,说白了,康熙所戒惧的,也是百姓所赞赏的,一是他始终保持着虽不得不妥协但绝不阿附,不得苟全但从不合污的清流身份;二是他始终保持着宁可清贫,不失节操,甘于淡泊,不求闻达的遗民心态。

对任何统治者来讲,文人中的大多数,他们是不会太放在心上的。“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早就把耍笔杆者的软骨头和脓包蛋,看得死死的了。无论哪个朝代的知识分子,不管明朝的还是清朝的,不管过去的还是未来的,按其生存态度而言,绝大多数是奉行“活着主义”的。在他们心目中,活着乃人生第一要素。活得好,当然好,活得不好,也要活下去。再好的死,不如再赖的活。活着,既是最高纲领,也是最低门槛。这类聪明和比较聪明的文人,通常不会抱残守缺,通常不会拿鸡蛋往石头上砸,通常不会只在一棵树上吊死自己,面对明清鼎革而发生的突然变化,这些“活着主义”者,相当程度地不自在了一阵。当最初的躁动不安期过去,随后的徘徊观望期过去,很快也就接受新主子坐稳了江山这个无法回避

的现实，遂有了改换门庭，重觅出路，调头转向，再寻新机的抉择。一个个或认输，或低头，或膺服，或投诚，来不及地向新朝效忠。对这些大多数信奉“活着主义”者的文人，康熙看得透透的，只消诱之以利禄，威之以强权，不愁他们不诚惶诚恐地跪拜在丹墀之下。

但是，文人之中，并非皆是随风转舵，见机行事，改头换面，卑躬屈膝，信奉“活着主义”的机会主义者。他们将品格的完整、言行的一致、信仰的忠贞、操守的纯洁，视为至高无上的道德境界，他们认为信念、理想、主义、真理，是与生命等值的精神支撑。既然如此，皇上说什么，威权说什么，主流说什么，甚至，老天爷说什么，他们那一根筋是不为所动的。

所以，像李颀这样既不抵制，也不反抗；既不合作，更不顺从的文人，在关中产生的巨大影响力，在全国产生的强大感召力，是康熙的一块心病。

早在公元1678年（康熙十七年），年轻气盛的玄烨，时方二十四岁，曾经想藉“博学宏词科”的征辟运动，使这位“关学”的领袖人物李颀就范，那是二十七年前的事情了。现在，已经很难厘清其时吴三桂正叛，战事吃紧，忙于调兵遣将镇压三藩的康熙，应该不会抛出，而且似乎不必急于抛出，这样一个属于意识形态方面的重大措施的隐情了。

我不禁想到，在这一年前的1677年（康熙十六年），所发生的两件事，是促使玄烨忽然心血来潮的起因。一是这年的十一月，康熙发出“博学宏词科”谕旨的前两个月，一个聪明得不能再聪明，滑头得不能再滑头，糟糕得不能再糟糕的高士奇入值南书房，为内阁中书，这个中国文人中玩文学、玩政治的八段高手，对此举的推动，当有重大干系。中国文人之收拾文人的不遗余力，远胜于中国皇帝之收拾文人的雷霆万钧。皇帝之收拾文人，固然可怕，但除了

政治，还是政治；文人之收拾文人，不但可怕，政治之外，还会纠缠进复杂同行相妒、文人相轻的感情因素，那结局必更为刻毒惨烈。他成为康熙倚重的文胆以后，绝对有可能，出这个馊主意。作为文人的他，作为同属顶尖文人的他，对那些不曾失节，更未叛卖，学望深远，举足轻重，品格完整，民望所归，一言一行，模范天下的同行，自然有一种无颜故国的惭怍。我相信，推动玄烨加快实施整肃政策，反映了高士奇拉大家一齐下水的阴暗心理。

高士奇(1643—1702)又号江村，杭州人。据说他进出内廷，必出袖中小金弹丸，馈送小太监们，故尔康熙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无不任其掌控之中，由此而获宠遇。御史上书弹劾过他，说他“出身微贱，其始徒步来京，觅馆为生。皇上因其字学颇工，不拘资格，擢补翰林。令入南书房供奉，不过使之考订文章，原未假之与闻政事。而士奇日思结纳，谄附大臣，揽事招权，以图分肥。内外大小臣工，无不知有士奇者。声名赫奕，乃至如此”。

然而，康熙却认为：“士奇无战阵功，而朕待之厚，以其裨朕学问者大也。”所以，他始终得到康熙信任。看来，一个聪明、滑头的文人，只要能唬住皇帝，再糟糕也能飞黄腾达的。

二是这年的十二月，康熙发出“博学宏词科”谕旨的前一个月，经学家张尔岐去世，这本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情，但张尔岐与李二曲过从甚密，加之作诗挽之的顾炎武，又同时是这两位经学、理学方面领衔者的共同朋友。虽然挽诗并无犯忌之处，“历山东望正凄然，忽报先生赴九泉。寄去一书悬剑后，贻来什袭绝韦前。衡门月冷巢鸾室，墓道风枯宿草田。从此山东问《三礼》，康成家法竟谁传。”但这种非体制、非主流文坛的地下活动，绝对是统治者所不乐见的。而且，清人陈康祺《郎潜纪闻初笔》卷八《李二曲》条目中所夸张写出来的状态：“一日，白昆山顾炎武元和惠周惕至，倒屣迎之，谈宴极欢。一时门外瞻望颜色，伺候车骑者，骈